

Studies on Great-Powers' Strategies:  
U.S., Russia, Japan,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in the Future World

俞正梁 等著

# 大国战略研究

未来世界的美、俄、日、欧(盟)和中国

冷战后美国重塑外交战略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大国复兴”战略

面向21世纪的日本对外战略

世界新格局中的欧盟战略

构筑伙伴关系的网络：

世纪之交中国的外交战略趋势

中央编译出版社

DS  
Y811

俞正梁 任 晓 殷志军 著  
陈志敏 陈玉刚 唐贤兴

# 大国战略研究

未来世界的美、俄、日、欧(盟)和中国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战略研究：未来世界的美、俄、日、欧(盟)和中国 /

俞正梁等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0

ISBN 7-80109-274-0

I. 大…

II. 俞…

III. ①国际政治—概况②国际关系、美、俄、日、欧盟、中—研究

IV. D5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6431 号

大国战略研究：未来世界的美、俄、日、欧(盟)和中国 俞正梁 等著

---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北京市朝阳区东方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80 千字

印 张：12.125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2001—5000 册

定 价：19.80 元

---

# 目 录

1	序 章
1 2	<b>第一章 冷战后美国重塑外交战略</b>
1 2	第一节 美国的战略选择
3 2	第二节 对欧战略与政策
4 5	第三节 对俄战略与政策
5 4	第四节 对日战略与政策
6 8	第五节 对华战略与政策
8 3	<b>第二章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大国复兴”战略</b>
8 5	第一节 冷战后时代：俄罗斯还是一个世界大国吗？
9 1	第二节 权威主义导向的秩序：俄罗斯的大国复兴战略
133	第三节 多极化和全方位伙伴关系：俄罗斯的大国外交战略

	<b>第三章 面向 21 世纪的日本对外战略</b>
184	第一节 世纪之交的日本对外战略
184	第二节 日本对美外交
200	第三节 日本对华战略
214	第四节 日本对俄战略
228	第五节 日本对欧外交
	<b>第四章 世界新格局中的欧盟战略</b>
249	第一节 冷战后的世界与新的欧洲
251	第二节 拓展与深化：欧洲联盟的诞生
266	第三节 对外战略与对外关系
276	
	<b>第五章 构筑伙伴关系的网络：世纪之交中国的外交战略趋向</b>
316	第一节 “准多极”国际体系与中国
316	第二节 “伙伴战略”：中国的国际战略
329	第三节 中国与大国关系的趋势分析
351	
383	<b>后记</b>

---

# 序 章

本书是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博士点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是一份关于2010年前美、俄、中、日、欧(盟)世界五大力量对外战略的研究报告。1991—2010年大体上是国际关系两极格局解体到多极格局基本形成的过渡时期。这一过渡时期的结束除了有赖于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外,主要取决于五大力量的战略走向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定位。

—

当代国际关系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国际格局首次实现了和平转换,大国冷战对抗迅速步入伙伴关系,这一切归因于历史条件的沧海桑田之变。

当代国际条件的嬗变孕育了半个世纪,导致这种历史巨变的深层次原因是世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世界生产力是国际社会发

展的根本力量。国际政治结构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必须与世界生产力相适应，并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

在科技不断创新的条件下，世界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是一个客观规律。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跃进到原子和电子时代，在短短的 50 年中，生产力的发展超过了产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发展的总和，创造出比历史总和多得多的物质财富，它既有量的飞跃，又有质的突变。当代世界生产力空前发展的主要后果之一是造成国际经济关系的整体化发展趋势。国际经济关系是国际政治关系的经济基础，前者的巨变必然会引起后者的变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否则便会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到头来被经济基础所摧垮。

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是多方面的。它给国际政治关系所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密切联动性与结构性冲突。发达国家基于现代科技的工业分工和工业部门内部分工，居于国际分工的主导地位，生产力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参加了国际分工协作，但往往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当代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细化和多样化，总体上加强了生产过程的国际化，以及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和密切联合，但是，当今国际分工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和它的不平等性，特别表现在南北关系上。当代世界市场在深度和广度上均得到大力拓展，各种类型的国家都依赖于世界市场来体现和实现自身经济的发展，它们都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大大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整体性发育，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与此同时，世界市场上的垄断与竞争更趋激烈，美、日、欧盟在世界市场上的三足鼎立是其典型表现。由于所有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活动，世界范围内商品流通规模空前扩大，国际贸易空前迅速发展，世界各国对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的依存性大为增加。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协调，充分体现了当代

国际贸易全球性迅速发展的需求,及其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空前重要性。这一切并不能排除国际贸易领域里发达国家之间日趋激烈的矛盾与斗争,也不能根本改善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不利的、不平等的和不合理的境遇。当代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工业增长速度,而国际金融的增长速度又大大超过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从布雷登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不断推进政策协调和监督机制,以适应当代国际贸易、国际信贷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需要。它既保证了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却也屡屡激起国际金融风暴,冲击世界经济。这一进程是美国与日欧(盟)兴衰转换的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歧见与纷争的过程。当代资本国际化是生产国际化的特产,它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矛盾深化的最活跃的因素。国际技术交流和跨国公司渗透全球。

总之,当代世界生产力的空前飞跃,扩大了国际范围内资源配置的范围、深度和合理性,为世界各国编织了一张相互依存的网。国际经济各个领域的发展趋势及其传导机制把各国经济连结成密切联动的有机整体,这是以国内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方式的普遍化为基础的。经济协调和合作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导方式。国际政治结构必须适应世界生产力所引发的经济国际化进程。后者对前者的质的规定性是整体性、有序性、协调性和合作性。目前,科技革命正在酝酿新的突破,它将给世界生产力带来新的飞跃,从而也将给 21 世纪的国际政治结构带来新的面貌。

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轨迹充分证明了世界生产力及其经济国际化的决定性作用,战后初期以两大阵营为依托的美苏两极格局,在本质上并不代表当代的基本历史潮流,它不仅在政治上割裂了世界,而且在经济上割裂了世界。它的基本特征是分裂—冷战一对抗,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分割了国际社会,破坏了国际社会在多样性基础上的整体性发展,极大地阻断

了各种资源的国际配置和跨国流动，严重地妨碍了国际经济及相关国家经济的发展，从而成为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

在近半个世纪中，当代国际条件深刻变化所包含的变革及其意义，长期被两极格局所抑制。但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它。世界生产力在不断积累能量，力图冲破两极结构的束缚。这种能量释放的政治方式是独特的。美苏两极由于热衷于调动全部资源用于争夺世界政治与军事霸权而迅速由兴转衰，两大阵营逐步解体，有关的各大国突破两极框架，向多极的方向猛进，发展中国家作为第三种力量崛起。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开始形成强大的动力，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关键的转折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受阻而积累的能量到了临界点，就以爆炸式释放摧毁了庞大的苏联，终结了两级格局，开创了走向多极化的国际政治新结构。这就是国际政治结构发生相应变革的历史必然性。国际政治结构并不是什么人按照抽象的固有的理论原则设计出来的，而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迁而逐渐发展而来的，只不过在历史巨变的一瞬间正式宣告它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爆炸式的能量释放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和平方式，而非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即大规模破坏生产力的方式。这是由当代世界生产力内在本质所决定的。从总体上和发展趋势来看，多极格局是符合世界生产力以及经济生活国际化根本要求的。正在形成中的多极结构，一般而言，是由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欧盟等力量构成的。它在本质上既区别于两极格局，也区别于近代几个势均力敌的列强争霸的多极结构。国际格局中变革性力量、和平力量的兴起，将极大地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尽管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期中，多极的不均衡性依然存在，但趋向于相对均衡并相互制约。当代国际格局的多极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世界权力的分散化和民主化。在世界范围内冲突和对抗亦趋于分散化、局部化。越来越多的国

家。尤其是大国,正在寻找并已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益的共性,对于世界整体性发展所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也越来越具有共识。多极格局结束了国际政治、军事大分裂,全球层次的政治稳定与和平局面得到了保证。这是国际大流通的基本政治保障。多极格局也结束了国际经济的大分裂,结束了所谓两个世界市场并行的格局,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进入国际大循环。这正体现了当代世界生产力对于全球范围内和平与发展的内在要求。

但是,不可否认,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特别是现在至2010年的过渡时期里,冷战思维与冷战遗风,集团政治,历史惰性,新的全球政治结构的冲突因素仍将长期存在。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着新旧交织的时期。尤其是考虑到世界性民族国家体制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动摇,国家利益的碰撞、冲突仍是不可避免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际社会两种状况并存:有序与无序、理性与疯狂、稳定与动荡、和平与战争、合作与对抗……旧时的一切仍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仍是21世纪国际社会的基本现实,但是未来的主导趋势是走向协调、管理、较为有序与组织化,世界将会加速整体性发展趋势。世界政府是不可取的,建立在越来越多国家利益共性基础上的国际政治新结构是积极有效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把握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有深度地分析美、俄、中、日、欧(盟)的战略走向与战略关系,正确引导21世纪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 二

冷战后国际形势的转折和演进,新的全球政治结构的构筑,比

人们预料的要快得多,也深刻得多,其最显著的标志是美、俄、中、日、欧(盟)世界五大力量的战略与相互关系带有根本性的调整趋势。

大国战略与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仅仅在冷战后时期开始后的短短几年内出现,决非偶然。摆脱了冷战羁绊的世界经济朝着全球化方向急速前进,市场经济迅速普及,全球问题不断激化,使得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日益深化,世界的整体性发展和多元化趋势日趋明显。在主权的民族国家仍旧是国际社会基石的情况下,国家生存的国际环境的这种新的急速变化,必然对国家的思维和行为产生重大后果。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自 1993 年以来出现了世界性的“伙伴关系”热,既有主要世界大国之间的双边伙伴关系,又有大国与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如中国与东盟国家表示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与加拿大、墨西哥决定建立“跨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美国与非洲六国要建立面向 21 世纪伙伴关系以及《美国—波罗的海伙伴关系宪章》、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法国与奥地利也建立了伙伴关系,也有地区、组织或其他国家之间的多边伙伴关系,如中亚多边伙伴关系、亚欧新型伙伴关系、印度与南非的“战略伙伴关系”、罗马尼亚与匈牙利、乌克兰与保加利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也建立了伙伴关系,以及一些中东欧国家已经成为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国”等。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已有近一半的国家置身于国际“伙伴关系”热之中,大国伙伴关系是其核心,它们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们敏锐地感觉到冷战后在稳定经济、消除金融危机、防止武器扩散、能源和环保、控制地区动乱、打击国际犯罪和贩毒等带有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上,相互间密切联动和相互借重,彼此间国家利益的共性在迅速增长,建立合作型的互动关系最有利于参与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新竞争,也最有利于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的增长,在 21 世纪国际关系中占据最有利的地位。这种

冷战后开始出现的新的外交思维,促成了各大国新的外交战略的逐步定位,主要大国相互间建立战略性的伙伴关系。1994年1月美俄宣布建立“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从同年9月到次年4月,中俄双方关系从“建设性伙伴关系”迅速升格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股战略伙伴关系之风悄然吹起,使1997年成为大国战略伙伴年。1997年5月中法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9月俄法将双方关系提升为“优先伙伴关系”;10月中美宣布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1月俄日商定建立“相互信任伙伴关系”。翌年3月,欧盟通过对华政策文件《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着重大而又深刻的调整。”

在冷战后国际政治结构的构建中,大国伙伴关系奠定了它的基础和架构,决定了它的基本特征、方向与趋势,这是由新型的大国伙伴关系自身的趋势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些趋势性的特点主要是:

(1)它的基础只能是日益扩大的共同的国家利益,是大国在全球、区域、层次上国家利益的交叉和汇合点。大国明确意识到它们在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推动区域合作以及解决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方面有着重要而广泛的共同利益,在进一步加强双边经贸、科技、安全、能源、环保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这一切构成了走向新世纪大国关系的战略基础。这意味着其伙伴关系的驱动力仍然是国家利益,只不过是国家利益的共性而已,这是大国关系的基本面。因此,必须要有大局观,要把携手维护共同利益为基本出发点。这也隐含着在双方难以找到国家利益共性的领域,仍旧存在着矛盾与斗争,对此应持灵活、务实与妥协的立场,以保持伙伴关系。这与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全面对抗是有根本区别的。同

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大国寻求共同利益困难重重，一波三折，互利是以条件为转移的，共同利益因而具有不稳定性，况且利益分配不均也会造成利益冲突，这里既有国家领导人自身思维的局限性，也有其他政治势力和社会势力为维护旧体制而进行的干扰。

(2)它的起点高。大国站在战略高度，怀着历史责任感面对新世纪，不囿于一时一事的得失，着眼于未来，着眼于全局利益和战略利益，以战略的眼光和长远的观点来审视和处理相互关系，排除各种干扰，克服短视行为，力求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机制。因此，大国赋予伙伴关系以“战略”二字。

(3)它的本质要求是非敌性，无论是互相之间，还是对其他国家，都互不敌对，即不针对第三国、不结盟、不对抗。冷战时期大国关系有明确的军事上的敌友之分。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大国伙伴关系的不结盟性质，是大国关系史上旷古未有的新鲜事物，具有21世纪的时代特征。这一趋势性的特点与大国关系的现实有着强烈的反差，它更多地预示着方向、趋势和未来。

(4)它的目标是在战略高度上建立平等、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的合作关系新模式。这种新型关系以经济与科技合作为重点，不断扩大经贸、科技合作与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求得共同发展、共同防范国际风险。这种新型关系以政治、军事合作为保障，以文化与社会发展合作为补充，是在合作框架内本着相互尊重、相互谅解、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原则，妥善处理彼此间的一切问题，包括分歧与争端，而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在对抗的框架内思考一切、对待一切，实行硬对抗。在大国伙伴关系中，一种互不对抗的模式为各方所接受，协调与合作是主导倾向，斗争通常在关系破裂前止步，一般不会失控，军事力量在大国关系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这是一种总体上和发展趋势上保持协调、合作与稳定的大国关系架构。

(5)它的组织保证是确立涵盖面大、运作性强的沟通、对话、磋商与管理的有效机制(特别是在高层),以确保关系的稳定性。走向稳定性和机制化的关系,是大国伙伴关系的鲜明特色。

(6)它具有这样的两面性和复杂性:合作与制约、协调与竞争、朋友与对手,这不仅是由于冷战后国际条件的巨大变革,而且是因为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所导致的大国力量均衡化,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斗争、互相制约的同时,相互协调、相互合作、相互借重的趋势日益加强。

(7)它具有连锁互动的特性。冷战后大国利益互相交汇、互相牵制,已形成密切的大国关系网络,大国都实行全方位外交,任何两方关系的变动,都会涉及其他大国的切身利益,有关各方也会作出反应,相应调整彼此关系,以维持多边协调和平衡的总体格局。在这个多边制衡机制中,五大力量会演化出为数众多的双边、三角或四角关系,从而形成错综复杂的连锁互动网络。加之,大国伙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因而,这又是一个非集团政治的连锁互动网络。这样,在当代多极格局的大国关系中,就失去了在近代多极格局与冷战的两极格局中所特有的大国关系中的惯常现象,即同盟与反同盟的基础,或几个大国联合反对某一特定大国的可能性。这同样有助于国际体制的稳定。

上述特点反映了面向 21 世纪大国关系的合理框架、正确导向和未来趋势。伙伴关系显然就是大国关系从未有过的进步,它有助于国际政治新结构的形成,从而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从现实国际关系来看,一方面大国伙伴关系要名符其实,还有艰难而漫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新旧两种战略合作并存,伙伴关系只是目前五大力量关系的一种模式,而且是唯一的新模式,现时仅适用于不结盟的中、俄之间以及中、俄与早已结盟的美、日、欧(盟)之间,即所谓 2+3 的关系中。中俄(苏)吸取了盟友一破裂一修复

一伙伴关系的经验教训，着意于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美、日、欧（盟）是结盟关系，是传统的战略关系，属于冷战的遗产，虽然它们也自称“伙伴关系”，但此“伙伴关系”非彼伙伴关系，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结盟关系是大国的传统与历史的形式，到冷战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般而论，它是因敌人而构建和存在，往往成为国际局势紧张的根源，而近年来的大国伙伴关系则不同，从本质上来说，它不是建筑在共同敌人的基础之上，它是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力求在相互关系和整个国际关系中创新和增加新的积极因素。人们常常会发生一种疑惑：现时正在建设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否也是一种结盟？按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战略是在战争中利用军事手段达到战争目的的科学和艺术。《辞海》则简洁地把它定义为“战争之策略”，似乎战略只与军事、战争、敌人有必然联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词意随着时代前进而扩展，当代人们在全局性、根本性的意义上普遍运用战略一词。现时的伙伴关系恰恰是在排除结盟的最广泛意义上的战略关系。此外，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人们对伙伴关系存在着另一种误解。中国古代兵制十人为一火，同火者称为火（伙）伴，从中引伸为共同参加某种组织或从事某种活动的同伴。西方人则非常自然地认为伙伴关系就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合伙人关系。两者有亲疏之分、高低之分、战商之分。在这种情况下，本着就低不就高以求共识的原则，应当把伙伴关系定位在以双赢（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合伙人”关系上，有所“合”必有所“不合”，一切追求盟友般亲密关系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尤其是在旧式的同盟关系与新式的伙伴关系并存的情况下，两者相互交叉，互相纠缠，相互渗透构成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现实，这在 2+3 的关系中有最典型的表现，而中美关系提供了最好的例证，美国的外交战略也是这种矛盾混合体的最好体现。大多数大国的战略与政策均由新、旧两种因素交织而成。大国演

奏的交响乐中,屡屡出现不和谐音。因此,我们在肯定大国伙伴关系发展大趋势并为之努力奋斗的同时,应当看到建立这种新型国家关系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不得不有防范意识,不得不作两手准备,预防最坏的现实,争取最好的未来。但是,新的外交思维及其产生的伙伴关系毕竟代表未来,冷战思维及其产生的结盟或敌对关系只代表落伍的过去,不合时宜,在大势所趋的较长历程中,美、日、欧(盟)的结盟关系因其原有基石的动摇,有向新型伙伴关系发展的趋向,尤其是美欧关系。

目前,大国关系正进入活跃期,尤以 2+3 关系的迅速调整最为引人注目。江泽民和克林顿实现互访,表明最重要而又最棘手的中美关系终于排除重重障碍,逐步定位,这是大国建设伙伴关系的主要标志。调整中的大国关系出现了一股好的势头,各方都注意寻求共同利益的重叠点,寻求协调与合作,寻求改善和发展关系,大国关系调整的主流是健康的,是合乎建设新型伙伴关系所需要的。这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也不是策略调整所致,而是一种基于当代生产力飞速发展造成的历史巨变基础之上的长期发展大趋势。

随着美、俄、中、日、欧(盟)五大力量的综合实力与总体战略的逐步定位和相互确认,它们都可以较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它们的相互关系进入相对稳定发展的新时期,到 2010 年前后,一个多元化的国际政治新结构将呈现在世人面前,21 世纪世界生产力新的飞跃将会获得较为可靠的政治保障。

---

# 第一章

## 冷战后美国重塑外交战略

### 第一节 美国的战略选择

1989年下半年，东欧开始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引起了滚雪球式的连锁反应，柏林墙倒塌。同年年底（12月），美国总统布什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举行首脑会晤，宣布东西方冷战已经结束。1990年，两德宣布统一，华约解散。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这一系列的发展，宣告了冷战的终结。这是世界历史中一个分水岭式的变化，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冷战后时代的开始。

世界政治中每一次重大的变化，都会引起美国国内关于其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大辩论。冷战的终结，是一种具有根本性意